

《老龄社会的革命》：我国对老龄社会准备不足

本报记者 蔡梦吟

中国日益逼近深度老龄化社会。本月，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博士出版新书《老龄社会的革命》，期待为“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并呼吁国家尽快建立应对老龄社会的中长期规划。日前，党俊武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逼近“中度老龄社会阶段”，却还没解决“进入老龄社会初期阶段”的问题

《老龄社会的革命》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有以下特点：超大规模——我国老龄人口目前超过2亿，到本世纪中期将接近5个亿；超高速增长——我国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600万左右，是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30余倍；超高度——目前我国老龄化程度达15.5%，在本世纪中期将接近35%；超稳定——有错误观点认为我国经历了三次人口增长高峰，这些人死后中国老龄化问题就会缓和，但事实上，本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老年将始终占据1/3的高比例。

“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老龄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民族兴衰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性问题。”党俊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本来在老龄社会初期、甚至未进入老龄社会之前就应做好准备的，我们在日益逼近中度老龄社会的今天，仍未解决。”

在党俊武看来，我国在人口上早已进入老龄社会，但在战略规划、制度安排、法律政策体系等方面还处在年轻社会。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必然遇到的问题。

作为世界上第一老年人口大国，我国目前尚无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中长期规划。据党俊武介绍，面对老龄化问题，我国的基本保障制度安排目前有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医疗社会保障制度，这两个制度仍亟



党俊武近照

待深化改革和健全完善；而面向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还是空白。

“通俗地讲，我国现在力图让老年人实现‘吃饭有钱、看病有钱’。但老年人一旦‘躺倒’了，卧床不起丧失行为能力了，怎么办？国家没有制度性的费用来源。如果老年人自己没钱、子女也没钱，那这个失能老年人的境遇就会非常悲惨。尽管失能老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不到20%，但谁敢保证自己就没有那一天呢？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党俊武说。

在我国，对老龄社会准备不足的远不止制度设计层面，其中，最大的不足，党俊武认为是“金融准备不足”。

“在许多发达国家，普通老百姓都持有几张保险单，或其他各种为老年期做准备的金融产品。在他们进入老年之前，就已经拥有充分的金融保障，可谓‘有备而老’。而在我国，老龄金融准备不足非常严峻。我参与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40-59岁年龄段者，只有极少数人会专门购买为养



党俊武近照

老做准备的金融产品。

今天的年轻人，要“有备而老”

社会养老的本质是什么？政府养老或纳税人养老，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吗？《老龄社会的革命》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养老的本质，是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即，一代人通过自身的劳动积累，购买下一代人生产的养老服务产品。老龄社会的文化，不是“养儿防老”，也不是“常回家看看”，而是要人学会终身自立，实现代际和谐。

党俊武告诉记者：“如果这一代的老人要靠下一代人来养活，这个社会不会进步，反而会倒退。事实上，从代际关系上讲，不存在哪一代人养哪一代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代际帮助、代际扶持的链条，来实现人人自我养老，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铁律。”

如今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出现了由养老金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党俊武认为，“这是在代际交换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他表示，欧洲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设计之初，其缴费的人多，领取养老金的人少。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体系便难以运转。

从这个意义上，党俊武建议今天的年轻人，要“有备而老”。在《老龄社会的革命》

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希望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的人，看了本书之后都能行动起来。”

党俊武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对当下年轻人而言，他基本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三大问题不解决，谈他们未来的养老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国家在扩大就业、保障房建设、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还需要下大力气。”

“在40岁以前重点解决三大问题，40岁之后，人们要从金融上为自己做养老准备。”书中指出，理想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应当是养老金、劳动收入积累和财产性收入这三者各占三分之一。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如下：依赖国家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占29.3%；依赖劳动收入的占20%（主要是农村居民）；依赖家庭成员供养的占48.8%；有财产性收入仅占0.3%。农村老年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镇老职工的福利房产尚未形成养老资产。

在美国、芬兰、日本等国，老龄人口普遍已经拥有养老资产和一定的人力资本，依靠家庭供养的情况很少。书中指出，“只有纠正我们的分配政策，做大老龄金融，让老年人拥有良好的资产结构和购买力，‘自我养老’才成为可能。”

人口老龄化，是挑战更是机遇

党俊武相信，“应对老龄化”与“实现中国梦”之间是“同构关系”。换言之，“中国梦”，某种程度上也是“老龄中国梦”。

《老龄社会的革命》一书中指出，老龄社会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难以预估的发展潜力。首先，老龄社会对金融业的发展将是一场革命。单个金融养老产品通常都以十年为周期，这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长期资本池”将有望做大，并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党俊武说：“举个例子，创业的年轻人，以往贷商业贷款只能贷两三年，未

来，贷款10年、20年都有可能，因为长期资本的盘子大了。”

此外，健康业将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目前，城乡老年人口中健康存在问题的、健康状况一般的和健康良好的分别占老年总人口的27%、56%和17%。在平均约19年的余寿中，健康余寿只有9年左右，其余10年基本上是带病或失能状态。这对老年保健用品、营养用品、医药用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健康辅助器具等健康产品生产销售来说，存在着巨大的开发服务空间，而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健康消费市场。

同时，老年病医院及康复护理机构建设也将助力GDP增长。目前，我国老年病医院及康复护理机构建设刚刚起步。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相应机构数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和床位数量都会成倍增长。对于发展老年医疗卫生产业而言，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器械配备以及人员培训等，这都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书中，党俊武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名字，“新生代老人”，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因为这些人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有着相对较好的收入水平，他们进入老龄之后可能不同于以往的老人。“新生代老人”不仅“自我养老”的能力较高，其精神文化需求也将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引擎。某种程度上，“新生代老人”也是老龄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强劲推手，其间蕴含的文化用品和文化服务商机无法估量。

在业界一些学者看来，党俊武的学术观点颇为超前。的确，与许多人“谈灰色变”不同，党俊武把老龄社会看成一个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健康长寿的社会形态。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如果站在年轻社会看待老龄社会的问题，必然令人悲观；但如果用老龄社会的新视角看问题，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机遇更大，前景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蒋肖斌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年年底，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达到2.21万亿元，这个数字到了2012年，上升至2.6万亿元，2013年，达到了3.1万亿元。养老的前路似乎越来越窄。近日，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书《解放生命》发布会。该书作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蒲坚提出了一条养老新路——信托养老。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解放生命》一书作序。厉以宁说：“寅吃卯粮是养老的行为本质，养老的实质是对未来预期的现实安排。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金融工具，解决个人的消费无规划和时空错位问题。养老信托连接养老和信托两个产业，是解决中国当下养老问题的可能选择之一。”

根据联合国拟定的老龄化标准，中国在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地区60周岁以上人口为2.1242亿人，占总人口15.5%，65岁以上老人有1.3755亿人，占总人口10.1%。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实际赡养比将从目前

中信出版社推出新书《解放生命》 “信托养老”突围养老困境？

的5:1上升为1:1，传统的养老方式愈来愈难以维继。

信托是一个金融名词，即信用委托。中国《信托法》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应用于养老，通俗来说，即老年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信托机构管理，通过信托公司满足其养老需求。

厉以宁与信托的关联始于1997年，他当时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正和其他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一起，呼吁立法机构加快《信托法》的制定。2001年，《信托法》的正式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国的信托业已经发生巨变。

厉以宁说：“信托作为金融行业，具有独特的财产保护和破产隔离功能，能保证老人养老财产的保值增值。信托的内涵之一是财产管理，能让老人享受到信托工具

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和转移效益；内涵之二是以遗嘱信托的形式实现财富传承功能；内涵之三是医养服务，信托能通过二次委托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联系、控制、整合相关的养老产业资源，为老人提供包括养老护理、医疗康复在内的全产业链服务。”

当代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归属民政体系管理。2006年，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相继发布了系列养老文件，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

蒲坚在《解放生命》中写道，从产业层面来看，联合国数据估算表明，老年人的综合消费比年轻人高18%左右，养老产业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约为4万亿元，这个数字至2050年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从企业层

面来看，我国由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0%，发展养老产业可以间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从信托公司层面来看，按照银监会指引，其核心业务是资产管理。老年人出于生理健康原因，必须委托个人或机构进行资产管理，信托业将因养老产业而迎来新一轮发展。从消费者层面来看，做好养老服务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显示，居住在美国太阳城等老年社区的老年人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0岁。

蒲坚说：“养老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是中国正在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世界性的共同挑战。养老保障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阶层分布、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代际关系、人文伦理、社会稳定、寿命预期、战略格局、发展方向都存在潜在的决策性的影响。”

蒲坚提出了一些新型养老的具体方式，如，“以房养老”，这并不是新话题，早在

2002年，时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的孟晓苏就提出过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实现以房养老。

蒲坚认为，市场化的以房养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房产信托化，通过信托公司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二是房产证券化，通过房产的出售、出租、置换等方式获得现金或者住房使用权。以房养老还可以与遗嘱信托结合起来，相关利益人对老年人的遗产继承要与养老义务的义务履行挂钩，并由信托公司监管其履行承诺。

再如，政府办公用房的区域置换。蒲坚认为，“老有所养”要有资金支持，而靠经济增长解决养老资金问题，时间太慢；靠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又会涉及利益调整，实现难度较大。为此，蒲坚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腾笼换凤、价值互换。

蒲坚解释：“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较弱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区域价值的提升。如果把北京二环内、尤其是长安街上的部委办公楼搬出核心区，把腾出的地块和建筑进行拍卖，所得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公共养老基地。”据统计，仅通过长安街行政办公用房的区域置换，就可以增加580亿元人民币公共养老资金。”

本报记者 蒋肖斌

敦煌遗书、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手书《金刚经》、宋代元明逸修本《宋书》、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草纲目》、清官旧藏《同治大婚典礼全档》……近日，“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在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举办。这是1949年以来，海内外民间珍贵古籍藏品的首次集中展示。

展览由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联合主办，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30名藏书家参展，展出展品115件，涉及敦煌艺术、佛教文献、宋元善本、明清古籍、民文文献、域外课本、碑帖拓本等类型。

国图古籍部副馆长陈红彦介绍了展览中难得一见的珍品：两件隋代的《大般涅槃经》单纸长140厘米，这样长度的藏品在世界范围内已知仅有6件，其中3件还收藏在英国的国家图书馆；宋嘉定六年(1213)

国家图书馆举办“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 别让民间藏书再度流散

淮安仓司刻《注东坡先生诗》，不仅历经名家收藏，还流传着多段历史故事，清代学者翁方纲曾因书而将书斋名改为“苏斋”；民间藏书家袁思亮家宅失火，几欲为其殉身；用西夏文书写的《择要常传同名杂字》是孤本，记录了西夏常用字词，加以音译，是十分难得的文献资料……

河南洛阳的白河书斋藏书博物馆是一家民办博物馆，馆长晁会元此次带了“馆藏之宝”明代金陵本《本草纲目》前来参展。这是国图法定的第3部“金陵本”（《本草纲目》的祖本——记者注），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晁会元带着这本书来到国图，顿时“艳”惊四座。为了保护这本书，尽管是私人收藏，国

图照样派了10名专家，耗费4年时间，用明代的老纸，为他无偿修复了这套珍贵的古籍。

陈红彦发现，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每次做名录评审，都会收录民间收藏家的藏品。陈红彦认为，中国历来有民间藏书传统，民间藏书是典籍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安全传承起到很好的作用。“私藏”是对“公藏”的补充和辅助，国家图书馆能形成今日的藏书规模，也得益于历史上很多藏家的捐赠或转让。

今年年初，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北京成立，本次展览也是协会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推广古籍保护工作迈出的重要一步。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说，当代藏书家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公

开展示或者影印出版，“与天下士子共之”，这次展出的台湾藏书家王水衷的敦煌遗书，即将出版。此外，藏书家们还继承了“丹黄手校”的优良传统，即亲力亲为校正、厘清版本。“现在留存的很多古籍，特别是珍本、善本，真正从‘公藏’传下来的没多少，大部分是藏书家的积累。”李致忠说。

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晓军回忆，浙江省图书馆最初的“公藏”只有《四库全书》，而现在“公藏”的大部分书都来自藏书家之手。徐晓军认为，应该增强“公藏”与“私藏”之间的交流，比如，私藏有一些雕版仍能用印刷，就可以作为公藏的供给。

社科院学部委员史金波面对琳琅满目

的展品，第一反应是“眼前一亮”，随即担忧的是，“可别流失到国外去。”过去我们有很多东西流失海外，很难再回到中国。现在我们的民间收藏藏在个人的书斋中，如果条件成熟，也不妨归入国家收藏。一旦流失，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古韵研究所研究员宋平生送了两部书参展：明万历皇帝的母亲所刻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明代环翠堂刻本《出像神玉记》。后者不见公藏著录，十分罕见，曾被国外买家买走，宋平生用三本书换了回来。“一定要把它留在国内。”宋平生说：“藏书是个人行为，但恐怕藏书的最终归宿，仍是各个公藏的图书馆。毕竟你不卖书，不能保证后人不要书。”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李善一直致力于清乾隆皇帝藏书“天禄琳琅”的研究。她发现，近年来，大量古籍在拍卖会上再度分散，“希望国家出力，有能力的藏家出力，让书能够尽可能集中，不要在当代人手上再四散了”。

“内容为王”本是出版业一个形象的说法，无非是在强调内容之于出版是何等的重要。过去，有人曾经试着挑战“内容为王”在出版业中的这个“王位”，于是就有了“渠道为王”、“服务为王”、“现金为王”、“资本为王”诸说，如此“称王争霸”其实都不过是在强调出版业的不同环节在不同时点的重要性。仔细一想，这些不同的环节本质上无一不是都在争“内容为王”这个“王”来服务。因此这样一争，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是进一步巩固了“内容为王”在出版业的王者地位。当然，我要强调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而已。

不曾想的是，到了当下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内容为王”这个形象的说法再次遭遇颠覆性的挑战，它不仅被作为传统编辑的“箴言”，而且还是“传统出版思维的典型表现”，由于当下的互联网使得“内容生产的王者地位摇摇欲坠”，因此“新时代表编要摒弃‘内容为王’的信条”。问题既然被提升到如此生死存亡、性命悠关的位置，那就确有必要就“内容”在互联网时代能否继续保持“王位”的问题较真了。

呆思录

为了保证讨论问题时逻辑的基本完整，还是先从所谓传统出版的角度来规范与界定一下“内容为王”所指。第一，这不过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第二，在出版业编辑、复制与传播的三个关键环节上，内容毫无疑问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没有其他都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内容为王”之立论也仅限于此；第三，从来就沒有人会无知到视一切内容皆为王者，“内容”从来都不是无条件地为“王”，只有那些优质的内容方可称王，当然，何谓优质又的确存在着仁见智的差别。

内容何以为王

互联网背景下出版业的“内容为王”之所指与上述传统出版时代的“内容为王”在本质上又是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无论是移动技术带来的即时传播还是数字技术促进的内容之多重利用，无论是多媒体技术丰富了内容的呈现形态还是大数据精准锁定的阅读需求，哪一样与“内容”无关？离开了内容，互联网的种种优势在出版业又体现在何处？

倒是需要特别说一下“内容为王”在互联网时代的特别重要性，如前所说：在传统出版时代，“内容”从来都不是无条件地为“王”，只有那些优质的内容方可称王。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出版，而且只会显得更加突出，这恰是由传统出版与互联网时代出版生产方式的不同所形成的。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对互联网时代内容生产这样的描述：互联网激活了从未有过的内容生产力，海量信息使内容越来越不稀缺。

陈女士所言或许极端了些，而且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熟，这些问题会得到一定的控制。但互联网上内容的鱼目混珠、质量的参差不齐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似乎又恰是互联网的宿命。如此这般，“内容为王”的法则又怎么可能只是传统出版思维的典型表现呢？

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不应该消解这一法则，相反还格外予以强化才是。出版人当然应该敞开胸怀，满腔热情地拥抱互联网为出版业带来的种种变革，但这种拥抱显然是为了出版业的更加繁荣，而繁荣的标志则在于信息传播更加快捷无误，知识传播更加精准，文明传播更加文明，这一切显然都不是“海量”与技术所能解决的。

青春书廊

主持人：陈馨瑶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这是已届85岁高龄的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近作。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莫如视之为醉心于历史研究的老先生回顾中国历史并反思一生阅历所得“大历史”观点的集成。

许倬云在“自序”中表示，“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围绕着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这样的终极问题，许倬云以扎实的深厚的历史学积淀为基础，用平易、简约的文字将新石器时代至清末的中国大历史娓娓道来，阐释并概括了中国这一“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回望历史，也映照现在。

《莎士比亚》

安东尼·伯吉斯最出名的作品固然是《发条橙》，其实身为学者的他，写起非虚构作品一样出色。这部《莎士比亚》完成于1970年，在众多的莎士比亚传记中令人惊艳：尽管关于莎士比亚的史料少得可怜，但通过伯吉斯的爬梳和描述，你会觉得“莎士比亚”不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是一本读来酣畅淋漓的书。要是那个时代的英国及莎士比亚作品略有了解，就更妙了，这样你就能对书中的俏皮话心领神会——比如：“约翰擅长装饰五指，他的儿子(即威廉·莎士比亚)日后则擅长装饰五音步。”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想要问你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刘若英勇敢提问并回答：我敢。

刘若英说：“现在回想起来，在生产前，安排写作这本关于‘自处’与‘相处’题目的书，对我来说，也许就像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般，在进入人生另一阶段前，透过与朋友的对谈，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并试着寻找未来可能走的路。”

朋友眼中的“奶茶”，天生就擅于独处。她知道去哪里买一人份的香蕉，知道失恋时要如何疗伤，她一个人吃饭、进展、看电影、唱KTV……“这些事儿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她的话语里没有半点逞强。

个体生命的本身，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孤独感与生俱来，这不意味着痛苦，这是一种跟自己相处的状态。叔本华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不如游泳》

她曾成功横渡达尼耳海峡，也曾成功挑战漫天大雪之中的室外泳池，也曾游过希腊的黑色火山岩海湾，也曾成功挑战肯尼亚北部群山之中小溪汇聚而成的池塘；她曾游过澳大利亚沙漠腹地的一池清凉碧波，曾在克里米亚半岛与苏联老炮共享一片海水，在贝弗利山与魔鬼身材的女星共用一条泳道……

林恩·谢尔在《不如游泳》一书中，以优美的文字记录了自己多次参加野外游泳赛事的经历，探寻了人们要游泳的原因，回望了历史上游泳方式的变迁和游泳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这项古老运动如何从个人行为越来越成为今天的社交活动，游泳的无穷魔力，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溢于言表。

《重遇未知的自己》

《重遇未知的自己》自2011年出版销量突破80万册，此次重装再版，作家张德芬把近年来自己新领悟到的成长经验融入书中，详细讲述了如何面对自己和生活中的不完美，同时新增的三篇文章仔细梳理了她和自己、事物以及亲人出现不完美关系的时候。张德芬表达了她的最新感悟：当困境来临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活得出来，你是否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承认、接受自己的不足，进而很快原谅自己，这才是成长的关键。

《国外全民阅读法律政策译介》新书发布

本报讯(吴琰 记者李润文)近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江苏省全民阅读办联合编撰、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国外全民阅读法律政策译介》新书发布会在第五届江苏书展上举行。

《国外全民阅读法律政策译介》译介了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十余个国家的全民阅读法律政策，全书内容涵盖了法案、法规、纲要、规划、报告等重要文献，并附录了国内相关学者和专家的高水准、综述性研究论文。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表示，全民阅读立法不是限制个人的阅读行为，而是要通过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为全民阅读提供更好的设施和体系。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郭书林认为，全民阅读立法正在起步的大背景下，本书的出版有望为我国全民阅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宝贵建议和智力支持。

